

张敬尧与裕湘银行

郝天豪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1918年3月, 湖南银行倒闭, 湖南币政几至不可收拾之地, 也更使湖南金融困窘, 财政枯竭。4月张敬尧督湘后, 锐意整顿金融以巩固其在湘统治, 创建了裕湘银行。该行开办以后, 代办省库, 经营存、放款、汇兑业务, 发行纸币等, 张敬尧极力维持。但由于中央支持力度薄弱; 湖南政局动荡、财政困难; 张敬尧个人能力不足, 随着张敬尧在湖南政权的结束, 裕湘银行也随之被取代。

关键词: 张敬尧; 裕湘银行; 湖南

中图分类号: K25; K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 (2013) 06-0023-03

Zhang Jing-yao and Yuxiang Bank

HAO Tian-hao

(School of Historic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With Hunan Bank being bankrupt in March 1918, Hunan government affairs on currency got into dilemma, which made it fiscal deficit. After governed by Zhang Jing-yao in April, a series of implements had been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reorganize the government finance and consolidate his ruling in Hunan. And Yuxiang Bank was established. Zhang maintained it energetically in managing the exchequer of Hunan, operating deposit and loan business, exchanging the old ticket coin and issuing paper currency. But because of some reasons, includ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u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Zhang Jing-yao, Yuxiang Bank was replaced after Zhang governed Hunan no longer.

Key words: Zhang Jing-yao; Yuxiang Bank; Hunan

张敬尧督湘之前, 谭延闿等多人先后执政, 湖南币政每况愈下。1918年3月湖南银行倒闭后, 币政形势几至不可收拾之地。张敬尧督湘后, 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整理,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创建裕湘银行。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于湖南金融的研究未有间断, 而且也取得一定成果, 但对张敬尧督湘时期, 尤其是对裕湘银行的研究仅在相关研究成果中稍有涉及, 乏善可陈, 甚至存有史实错误^①。本文拟以裕湘银行为切入点, 管窥张敬尧督湘时期面临的湖南金融困境和所采取的措施, 以期对近代湖南及民国初年的金融研究有所裨益, 同时也希望对当下金融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一、张敬尧创建裕湘银行

张敬尧 (1881—1933), 字勋臣, 安徽霍丘人。早年入伍, 曾入北洋新军随营学堂学习。民国以后, 历任陆军第六师十一旅二十二团团团长、第三混成旅旅长、江西南昌镇守使。护国战争时率部入川作战, 升任陆军第七师师长。1917年“丁巳复辟”失败后, 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 旋调任察哈尔都统。随着“护法战争”战事的继续, 张敬尧率军入湘。1918年3月底, 被任命为湖南省督军兼省长。

4月4日接印视事之后, 张敬尧清醒地认识到湘省“兵事尚在进取, 财政尤为艰窘”^{[1](P150)}。而当时的湖南财政也确实早已罗掘俱穷。至1917年10月湖南财政厅长袁家普卸职前夕, 财政厅共亏欠湖南银行银元1千余万元、银2千余万两、钱70余万文。延至1918年3月张敬尧督湘前, 又亏欠湖南银行银元300余万元。“至湖南银行历年另案垫付中央军费及本省筹饷公债历次息金各计银元数百万元, 尚不在内。而湘省未经收复之时, 由敌军直接提用湖南银行暨各分支店款项未拨入金库账内者, 尤不知凡几。”^[2]

湖南财政向来依赖湖南银行为之周转, 然而湖南银行却在兵兴之时惨遭灭顶之灾。1918年3月24日, 桂军将领谭浩明、程潜等在一日之内向湖南银行提去现款及票洋达50余万元。次日桂军南撤, 湖南银行总、协理等均不知所踪, 行内无人主持, “溃兵纷纷闯入, 乘机抢劫, 囊括席卷, 肆行捣毁”, 湖南银行损失巨大, 仅货币一项, “计实被匪截去现金及银票共九十七万九千一百七十余万两、现银元及银元票共二十九万三千七百三十余元、现铜元制钱及铜元票共三百五十八万五千五百四十余串”^[3], 行内所存各类田房契据、内国公债票、湖南筹饷公债票、湖南有奖公债票、新华储蓄票、印花税票、交通证券及各处股票等有价值证券达24万余元、银1000两也遭劫抢, 家具及办公用品也被拿走, 账簿残缺不全。

湖南银行的倒闭加剧了湖南币政、金融乃至财政的紊乱。事实上, 此时的湖南银行早已不能履行其应有的职能了。湖南银行, 系1912年4月由湖南都督谭延闿改组湖南官钱局而成。“成立之初, 大局甫定, 湘中政费及市面周转皆仰给于该行。”^{[4](P851)}迨民国以后, “频年军兴, 机关林立, 支款无节, 政府罗掘无术, 事事取给于银行, 于是银行不啻为一种特别支应之所。”^[5]可以说, “湖南银行自始至终只对省财政负责。”^{[6](P212-213)}而湖南财政如此不敷, “当时恃为弥缝者, 又专在添发湖南银行纸币, 票币发行数目, 遂为无限制之膨胀。”^{[7](P162)}据张敬尧督湘前后的调查显示, 湖南市面上的不换纸币及各项无价证券共达1亿元以上, “有桂军携来之广西银行纸币二三百万, 在衡、宝一带强迫行用者, 尚未算入数内。”^[8]

无论是银行信用紧缩时期, 还是较为充裕时期, 财政向

银行透支，迫使银行财政性发行货币，结果必然造成社会信用的一再膨胀，增大流通中的货币量，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至1918年初，湖南纸币价格日落，湖南银行银两票不及原价一折，铜元票和银元票仅在原价三折左右，而现货价格日高，“以是百物价值随之而涨，票银十两仅买谷四石有奇，每米一石竟糴钱二十四五串”^[9]。严重的纸币价格下跌，最终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尽管如此，湖南银行倒闭后，湖南实业银行和湖南储蓄银行等亦随之停业，湖南一时间没有一家当局掌握的银行来发行钞票。张敬尧督湘伊始，即考虑恢复湖南银行。甫入长沙，张“拟向中央借款六十万元，或向鄂省借现款六十万元，以为湖南银行基金，庶该行得以早日恢复。”^[10]之后“张以前谭浩明在湘时向上海某书局定印之南票五百万张，仍请其继续印成送来，酌定通用，作为湖南银行之基本金，使全省金融活动。”^[11]但当湖南银行倒闭成为既成事实后，张敬尧开始一面设处清理旧银行，一面着手创建新银行。

而从湖南当时情况看，新银行的创建势在必行。湖南银行倒闭后，所发纸币流通不畅，烂票无人收受，“市面对于纸洋烂票均极停滞，交易之间，动辄发生纠葛。各商店不胜其苦，至有闭门歇业，以避此难关者。”商会认为“票币之行消，原观银行为死活”，提出为今之计，“非由银行酌量收旧票，分别收换，则纸洋、烂票终无流通之希望”^[12]。张敬尧也认为湖南银行被劫，金融机关停滞，官商困难，不得不筹设新银行，以资流通。这在其裕湘银行设立原委的布告中则说得更为直白：“惟是湘省大兵之后，商务、实业诸待进行，若无一确实可靠之现金银行为之中坚，则市面困难，金融活泼，即旧银行之设处清理亦属空谈。”^[13]

1918年8月24日，经中央政府财政部批准，裕湘银行在长沙湖南银行旧址开业。督军公署军需课长杨从权任银行监理、李秉珩任副理，杜占鳌任经理、许继瑛为副理。银行资本总额原定1000万元，官商各半，其中官款来源是中央拨款200万元，以米盐公股向某国公司押借300万元。

关于裕湘银行的创建，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该行的管理层。张敬尧设处清理湖南银行，任命杜占鳌为总理，许继瑛为协理。裕湘银行成立后，张将湖南银行清理处总理、协理改为处长、副处长，仍以杜、许二人兼署。这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整顿湘省金融，当然，另一方面也便于对两处进行管理，易于实施某些政策倾斜。二是该行实际资本总额未达到原定额数。据许继瑛在银行开办之际称：“现官股方面，中央准拨二百万元，陆续可汇到，前拟以米盐公股向洋商押借数百万亦在定约。商股已招得二百五十万元，又商界存款数十万元，其商股以外省商人为最多。”^[14]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张敬尧仅以当时第七师及第十八师两师军饷作为基金，“并无商股在内，而实际势力尚不及定额三分之一”^{[15] (p125)}。资金不足，裕湘银行势必举步维艰。

二、张敬尧极力维持裕湘银行

裕湘银行方告建立，就要担负起省银行的职能，首要的即是代理省份金库。湖南银行被劫的同时，省库也因乱毁坏。张敬尧督湘后，暂令在财政厅内设临时收支处，总司收支一切事宜，并暂以湖南储蓄银行为出纳现金机关。裕湘银行成立后，张敬尧下令自1918年9月1日起，“归并裕湘银行代办之分金库，按照手续办理登记收入、各处征解税款及支付各项经费事宜，即以裕湘银行为出纳现金机关。”^[16]临时收支处则在8月21日之前将所有一切收支款项交接清楚后裁撤。直至8月的各机关经费，若已由财政厅发出支付命令，但尚未支出的各款项，仍应继续有效，移归分金库接管。

与其他银行一样，裕湘银行也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开幕之初，该行打出广告，“放款取息，低廉存款，格外优待，沪汉京津及本省外埠已设汇兑之处，款项汇兑汇费从轻，到期不误。对于各界交易，均属一律待遇，务以共跻和平活动金融为宗旨。”^[17]不过，裕湘银行的存、放款业务一直都比较萧条。张敬尧离湘后，该行留在长沙各钱店的期票款约银元4万元、铜元1万串，均被谭延闿、赵恒惕等收作军饷。

相对于存、放款业务，裕湘银行的汇兑业务则不可同日

而语，这是与张敬尧的政策紧密相关的。湖南银行倒闭，所发纸币无法流通，张敬尧规定法价，设处兑换之。裕湘银行纸币发行之时，只做现货生意，不兑换湖南银行票币。裕湘银行发行纸币之后，张敬尧规定兑换办法，“凡裕湘银行铜元票作为实铜元，每票一串兑铜元一百枚，若以湖南银行票兑换裕湘银行票，须以四串折合一串，折合互换之后，即可兑换铜元，若持湖南银行票直接兑取铜元，该行概不照兑。”^[18]后由于市面光洋价格不一，张敬尧令裕湘银行根据汉口光洋行情，每十日标示一次，但“此项牌价系为各色人等以光洋对于湖南银行新旧铜元票出入折合及商家买卖物价有所准则而设”^[19]，裕湘银行原定交易规章不变。

汇兑业务的开展促使张敬尧撤销了军用兑换处。军用兑换处是张敬尧在督湘之后为便利周转之故，“由商会发行军用铜元兑换券数十万，归湘鄂印刷公所承印”^[20]。裕湘银行开办后，军人也可前往该行交易，军用兑换处已经失去了设立的必要性。1918年10月，长沙总商会会长张先赞呈请张敬尧，撤销兑换处，以期收束。而该处所发行的兑换券，也经陆续收回，打孔销废，尚未收回数额不过四千余串，不难限期收竣。“至所费票本及薪资火食，除照章收取手续料相抵外，约共尚少一千三百余元，由该会另行设法弥补，以资结束。”^[21]11月初，张敬尧准予撤销军用兑换处。商会当即布告，称有军用兑换券3000余串尚未兑取铜元。12月，军用兑换处撤销，尚未兑现的军用兑换券停止流通，但为数甚少。

发行新票币，是张敬尧整理湖南混乱币政的一种措施，也是设立裕湘银行的主要目的之一。该行成立之前，“其发行票币之数，定银元票为一千万元，铜元票为三千万元。铜元票币，即就旧银行去岁在商务印书馆订印之新铜元票四千万串中提出三千万串，加印‘裕湘银行’图记发行。银元票则向北京美钞公司订印，现已双方订立合同，限于两个月交货。”^[22]该行规定“所发银元、铜元两种票币不拘多少，随到随兑，绝无留难，并准完纳田赋、厘金，各界往来一律平等待遇。”^[18]

为取得人民对裕湘银行票币的信任，张敬尧事先做足了工作。在银行开业前数日，张由造币厂调运大批铜元，车挑担负，络绎不绝，先声夺人。紧接着又传出消息，谓银行内铜元堆积如山，触目皆是，不可胜计。1918年8月底，在紧锣密鼓之后，张敬尧布告裕湘银行先发行了百枚铜元票一种，“以一当一，随时兑现，并准完纳本省田赋、关税、厘金，俾广流通，而维信用”^[23]。为推广该行纸币，张同时准许信用较好的商业银行、公司、商店缴纳现金8成、准备金2成后领用。张还在1919年2月规定，凡用裕湘银行票币完纳田赋、厘金的，每串减收铜元2枚，并在常德设立分行，在湘潭、宝庆、岳阳等处设立兑换处。3月，该行开始发行面额1元的银元票。5月，该行又发行面额5元、10元的银元票。

对于裕湘银行票币，一方面，湘省人民害怕其会如同湖南银行一样，心存芥蒂，但又不敢拒用，故随收随用，要求兑现者多。另一方面，张敬尧全力支持该票币，委托长沙25家钱店代兑，不限数额，也不扣水。总体来看，至1919年底，该票币也算流通无阻。但自1920年初开始，各县、厘局对该票币故意挑剔、折扣，甚至以不辨真伪为由拒绝收用，张敬尧先后发出训令、布告，声称裕湘银行“系官有性质，资本充足，由政府完全负责，绝无使商民受分文损失”，以后若再发生这种事情，“准各该商民指明呈控，或扭赴官厅惩办。本督军兼省长查核属实，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24]

5月底，南军趁吴佩孚衡阳撤防之际，出兵北进，裕湘银行出现挤兑，继以现款不敷，只兑铜元。6月4日，该行职员因时局紧张，纷纷移居行外，杜占鳌悬挂“开幕纪念，停止营业三日”之牌以掩人耳目，市民见状大起惊惶。张敬尧闻讯，急至该行，责令照兑。此后兑现更为拥挤，又因军人介入，市民难以兑现，开始拒用该票币。张敬尧一再令警察厅通知长沙总商会，“对于裕湘银行之银元、铜元各种票币，务仍照行使，一律收用，勿得拒绝”^[25]，“并派出密探数

十人严密侦查，如有对于裕湘银行票币擅自拒绝者，一经查觉，定按军法从事。^[26]

但随着张敬尧在湖南统治的结束，裕湘银行已是强弩之末。6月11日，银行守卫部队和行员先后撤离，杜占鳌也随之偕军政执法处长赵增祺离去，银行倒闭。从裕湘银行票币发行的整体过程来看，该行共印发铜元600万串、银元票300万元。由于湖南人民甫受湖南银行倒闭之苦，对该行纸币极不信任，“故实际流通数量仅银元票七十万元，铜元票二百万串”^{[15] (P1205)}。银行倒闭后，留存在市面上的该行纸币也是无关大碍，据时人估计，“该行银元票在外者祇八万余，铜元票在外者则数百万串。”^[27]

三、裕湘银行失败的原因与启示

裕湘银行是张敬尧湖南政权的产物和支撑。一方面，裕湘银行是张敬尧整顿湖南金融中的一幕，其目的是想通过该行及所发纸币来盘活湖南金融。自该行开办以来，张敬尧在代办省库、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发行纸币等职能上极力维持。为了尽快收到效果，张还重开造币厂，并自兼厂长一职，以2年为期，“俾裕湘银行相辅而行，于湘省财政前途裨益匪浅”^[28]。另一方面，张敬尧与裕湘银行是一体的。1919年3月，张曾亲临该行兑换处演说，宣称“裕湘银行系本督军倡办，尔等若不信用裕湘银行，即系不信用本督军。”^[29]但随着张敬尧在湖南统治的结束，裕湘银行也随之被取代。张敬尧如此苦心维持的裕湘银行最终失败，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第一，中央支持力度薄弱。张敬尧督湘之初，曾提出请求中央政府拨款现洋千万以解决湖南金融问题的治标办法，遭到中央政府的拒绝。后来张敬尧又打算呈请中央政府发还湖南代垫军费以整顿金融，并派财政厅长严家炽赴京面呈，但中央政府一直没有实质性作为，只是一味的“哭穷”和敷衍。交通部咨复中央财政困难，一时间实在无力拨付。国务院则表现出一副“和事佬”的姿态，表面上答应由财政、交通两部各自将拖欠款项分别如数拨还，但实际上并没有切实追究。事实上，非但不能要回原代垫军费，张敬尧督湘期间也只能继续自己筹饷度支，至离湘之前已代发现洋千万以上。如此看来，张敬尧尚且不能从中央获取军费，更不用说请款创建、维持裕湘银行了。

第二，湖南政局动荡，财政困难。民国以降，湖南迭遭兵灾。袁世凯帝制时期，湖南即是重要战场。段祺瑞奉行“武力统一”政策，湖南更是直接成为南北两方力量的角逐地。兵灾之后，继以水灾。1918年底，《申报》曾以教育费用一项为视角，报载认为此时的湖南政府绝无维持金融的能力：“即此一端，已可见湘政府之困穷达于极点，而欲求其维持票价，岂可得哉？”^[30]湖南政治拽离破碎，财政亏空，自然无法向张敬尧政府创建、维持裕湘银行提供有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若张敬尧为维持裕湘银行而对湖南进行强力索取，必然会遭到湖南绅民的抵制和诟病。

第三，张敬尧个人能力不足。1917年北军入湘后，湖南不仅南北对峙，即使北军控制的地区也是分而治之，曹锟、张怀芝、冯玉祥、张宗昌、吴佩孚等军事力量均各自为政。身为督军兼省长的张敬尧仅是北军力量之一，必然不能控制湘南的政治军事力量，“方张敬尧在长沙开办裕湘银行之时，湘南之独立政府，亦设立永州新银行，发行票币，以济军需，分大洋、小洋票两种。”^{[7] (P184)}实际上，张敬尧对北方其他力量也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张敬尧之一切命令不能出湘垣，如系军令，且不能出督军署。”^[11]财政收入因之锐减，“盖不仅湘属各县半在南军之手，即在北军势力范围中者，亦常有军队擅自就近提拨之事。”^[31]令行不止、收入锐减，既是张敬尧个人能力不足的体现，反过来又加剧了张敬尧创建、维持裕湘银行的困难。

客观而言，湖南银行倒闭后，湖南所存在的原有银行只有寥寥数家，且也都岌岌可危，迫切需要一家银行担当起省银行的责任。不过，裕湘银行虽然较原有银行稍有势力，也得到了张敬尧的极力维持，但当时政局动荡，皖系中央政府

和湖南政府因财政困窘而无力支持，以致该行出现准备金不足、资金周转不灵等不稳定因素。需要强调的是，湖南民众深受湖南银行之害，不信仰银行的心理自然存在，“纵然行用一点票币，总是不肯收留，所以裕湘银行的兑换生意颇好，然而对于金融的活动就不能说了。”^[32]政府信用缺失，民众不信任普遍存在，裕湘银行的失败实属必然。实际上，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政权更迭频繁，以银行为主体的财政经济随之兴起和夭折，一直处于这种恶性循环的泥沼之中。

参考文献：

- [1] 林开明，等．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8）[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 [2] 严财政厅查报湖南历年财政情形原呈 [N]．大公报（长沙），1918—08—31（6）．
- [3] 补誌湖南银行被劫详情 [N]．大公报（长沙），1918—07—15（6）．
-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5] 湖南银行总清理处呈报清理办法原文及省长批令（续）[N]．大公报（长沙），1918—08—14（6）．
- [6] 杜恂诚．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 [7] 曾赛丰，曹有鹏．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第一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 [8] 请看湘垣之纸币杀人 [N]．晨报，1918—04—11（6）．
- [9] 湘省之金融与民食 [N]．申报，1918—03—11（6）．
- [10] 湘垣之最近情状 [N]．申报，1918—04—09（6）．
- [11] 湖南内部之近况 [N]．申报，1918—04—29（3）．
- [12] 纸洋烂票充塞省垣之困苦 [N]．大公报（长沙），1918—05—21（6）．
- [13] 布告设立裕湘银行原委 [N]．大公报（长沙），1918—08—24（6）．
- [14] 裕湘银行进行资本 [N]．大公报（长沙），1918—08—25（6）．
- [15] 朱羲农，朱保训编纂．湖南实业志（二）第9编第3章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16] 裕湘银行代办分金库 [N]．大公报（长沙），1918—09—01（6）．
- [17] 裕湘银行广告 [N]．大公报（长沙），1918—09—01（2）．
- [18] 裕湘银行之开幕 [N]．大公报（天津），1918—08—09（2）．
- [19] 裕湘银行布告 [N]．大公报（长沙），1918—10—23（6）．
- [20] 湘中现状之一斑 [N]．大公报（天津），1918—04—23（2）．
- [21] 呈请取消军用兑换处 [N]．大公报（长沙），1918—10—20（6）．
- [22] 湘省金融之整理谈 [N]．申报，1918—07—16（6）．
- [23] 发行裕湘银行铜元票布告 [N]．大公报（长沙），1918—09—11（6）．
- [24] 严禁折扣裕湘票币 [N]．大公报（长沙），1920—02—27（6）．
- [25] 警厅函请维持裕湘票币 [N]．大公报（长沙），1920—06—07（6）．
- [26] 关于裕湘银行之要闻 [N]．大公报（长沙），1920—06—05（6）．
- [27] 最后三日之裕湘银行 [N]．大公报（长沙），1920—06—13（6）．
- [28] 张省长活动金融之计划 [N]．大公报（长沙），1918—06—23（6）．
- [29] 督军关于兑换新票之演说 [N]．大公报（长沙），1919—03—06（6）．
- [30] 湘省金融枯竭之近状 [N]．申报，1918—12—29（7）．
- [31] 湖南之财政状况 [N]．申报，1918—08—27（7）．
- [32] 湖南最近之银行与钱号 [N]．大公报（长沙），1919—08—24（6）．

注释：

①目前关于裕湘银行的研究成果比较少。据笔者查阅，姜宏业所著的《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章第十一节“湖南的地方银行”是对此有概括介绍的少数著作，其他著作涉及此问题时都十分简略。论文方面相关成果主要有吴筹中、朱肖鼎的《清代和民国前期湖南的金融机构和纸币发行》（《财经理论与实践》1986年第1期）；刘兴豪的《1912—1937年湖南经济现代化研究》（浙江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张丽的《1927—1937年湖南银行业研究》（湘潭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等。